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THE ECUMENIC AGE

天下时代

秩序与历史 卷四

Eric Voegelin

[美国]埃里克·沃格林 著 叶颖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天下时代

秩序与历史 卷四

Eric Voegelin

[美国]埃里克·沃格林 著 叶颖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秩序与历史. 卷四, 天下时代 / (美) 埃里克·沃格林 (Eric Voegelin) 著; 叶颖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4

(人文与社会译丛 / 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Order and History, Volume IV, The Ecumenic Age

ISBN 978-7-5447-7233-4

I.①秩… II.①埃… ②叶… III.①政治思想史-世界-古代 IV.①D0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7045 号

Order and History, Volume IV, The Ecumenic Age by Eric Voegelin

Copyright © 2000 by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MO 6520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3-158 号

天下时代 [美国] 埃里克·沃格林 / 著 叶颖 / 译

责任编辑 熊钰

装帧设计 胡荻

校对 叶显艳

责任印制 单莉

原文出版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箱 yilin@yilin.com

网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875

插页 2

版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7-7233-4

定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目 录

编者导言	001
致 谢	035
详细目录	037
导 言	047
第一章 历史创生论	116
第二章 天下时代	182
第三章 历史过程	250
第四章 征服与逃离	300
第五章 保罗的复活者意象	332
第六章 中国天下	371
第七章 普遍人性	404
索 引	448
译后记	523

编者导言

埃里克·沃格林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而《天下时代》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作为《秩序与历史》（五卷本，1956—1987）的第四卷，《天下时代》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十七年后，于1974年出版。虽然沃格林的写作持续至其生命尽头，但作为《秩序与历史》第五卷，也是最后一卷的《求索秩序》（*In Search of Order*），在他1985年1月去世时仍未完成。《求索秩序》表明，作为一位年届八十四岁的思想家，沃格林仍在到达新的高度，但是，无论是单薄的那一卷，还是他的其余任何著作，就哲学深度、理论广度或解释力而言，均无法与《天下时代》匹敌。《天下时代》是一项令人惊异的成就，但读者也应注意：本书极富挑战性，需要付出多年的沉思性研究，而收获也将不菲。

事实上，当我们把《天下时代》放在这套《全集》中再次出版时，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部未被消化的著作，仍在其众多维度所涉及的多个学术领域中具有爆炸性的影响。在它首次出版二十五年后，新的解读与评论仍在涌现，这表明学者们仍在致力于对它的研究。虽然这些新出现的二手分析更深入、更具洞察力地挖掘了本卷的丰富内涵，但对《天下时代》的充分鉴赏并非既成事实，而是未来的一项挑战。我在这篇导言中的目标是（极为节制地）阐明本书与《秩序与历史》的关系，

以及它的内部结构和若干关键概念，从而协助那些准备迎接这一挑战的人。

当然，我也乐于承认，为本卷提供导言这一行为必定显得有些大胆，因为它已经包含一篇由作者自己撰写的、极为凝练的、长达五十八页的导言。不过，沃格林非比寻常的开篇章节实际上与其说是本书的导言，不如说是就其思想在1974年时所遵循的新方向给出的导言。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我所做的也就显得不那么冒昧了。明显的是，沃格林感到有必要提供这样一份导言。鉴于沃格林在《天下时代》的出版与《秩序与历史》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出版（1957）之间的十七年中的活动和著作发表情况，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他在德国的行政职责占据了这一时期中的大量时间，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离开美国，离开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后，沃格林在慕尼黑建立了一个政治科学研究所。¹在此期间，沃格林只出版了两本书：《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²，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著作，主要由之前发表过的一篇文章和一次讲座的文本组成；《回忆》³，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但直到1978年才有英译本。

1 参见沃格林的“致谢”，下文第33页（英文原版页码，见本书边码。“编者导言”部分下同。——编注）。以下所有仅包含出现在EA（表示*Ecumenic Age*）之后的页码的引用，都是针对本卷的。关于沃格林前往德国的原因，参见他的*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ed. Ellis Sandoz (1989; availabl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 91。

2 即*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Gnosis* (1959)的译本，美国版有一篇前言（Chicago: Henry Regnery, 1968）；重印收于*Modernity without Restraint: The Political Religions,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d Science, Politics, and Gnosticism*, ed. Manfred Henningse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vol. 5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以下简称为CW）。

3 Eric Voegelin, *Anamnesis: Zur Theorie de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Munich: Piper, 1966). 由格哈特·尼迈尔（Gerhart Niemeyer）翻译的英文节译本，连同新添加的第一章《对过往之事的记忆》，以《回忆》（*Anamnesis*）为名出版（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8）。

沃格林在此期间发表过一些文章和某些著作章节,其中一些确实提示了新方向。⁴但是,根据我的统计,在他1957—1974年间发表的三十篇文章中,只有十二篇以英文写成,另有两篇原文为德文和法文的是以英译本形式出现。因此,英文读者几乎不曾见到过以书籍形式出现,并能使他们对《天下时代》的全新因素做好准备的著作,而且,在《天下时代》之前发表的那些文章或章节也无法容纳沃格林思想新阶段所进行的广泛讨论。⁵该任务必须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进行,并因而必须由《天下时代》本身来完成。

沃格林立即启动了这项任务。他在本书第一句即宣布,《天下时代》“背离了我曾经为《秩序与历史》设定的计划”。不难想象,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沃格林的许多崇拜者毫不怀疑地打开这本期待已久的书,期望看到原定计划的完成,但他们在第二页看到的却是一句断言:原定计划“不可行”。在其“导言”的其余部分,沃格林对此结论加以解释,将他修改后的分析模式运用于许多曾在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导言中探讨过的相同理论问题。但是,他并未就作为一个整体的这本书提供一份常规性的导言。他没有预告本卷的整体计划,甚至也未提到具体的章节——有关某种统一结构的介绍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在分析过程中径直出现了许多新概念,它们对于理解沃格林修改后的思想模

4 其中,提示了沃格林思想新趋向的最重要文章是“Immortality: Experience and Symbol”(1967)、“Configurations of History”(1968)、“Equivalences of Experience and Symbolization in History”(1970)、“The Gospel and Culture”(1971),以及“On Hegel: A Study in Sorcery”(1971),它们全都发表于这段过渡期的较晚时候。这一时期的所有文章如今都收录于*Published Essays, 1966—1985*, ed. Ellis Sandoz(1990; availabl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 vol. 12 of *CW*。

5 因此,即便是格哈特·尼迈尔(他是沃格林的朋友,紧密追随他的工作,在数十年间保持着罕见的洞察力)也在1976年认为:“当第四卷最终出现时,它在令人完全始料未及的路线上延续了整部著作。”Niemeyer, “Eric Voegelin’s Philosophy and the Drama of Mankind”, *Modern Age* 20(1976): 28—39, 30。

式至关重要,并使本书有别于前三卷,却在行文中悄然出现,未予解释。⁶虽然一份更合常规的导言也许能防止出现误解,并使这本极具挑战性的书变得相对易懂一些,但沃格林显然有不这么做的理由。⁷在接下来的评论中,我希望为沃格林的文本补充背景信息,这些信息将有助于读者(尤其是那些初次遭遇《天下时代》的读者)与这部伟大著作进行一次更富成果的接触。

《天下时代》与《秩序与历史》

尽管有长期的间隔,研究方法也改变了,沃格林仍选择将《天下时

6 以这种方式引入关键术语的例子包括:metaxy(居间)(EA, 50)、balance of consciousness(意识均衡)(75)、metaleptic(参与的)(105),以及egophanic(自我显现的)(96)。甚至连“天下时代”也是直到第67页才出现,并且直到第167页才得到说明。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本书的这种独特性损害了最初一轮书评的质量。

7 我只能就这些原因可能是什么做出推测,但我强烈感到,沃格林其实只不过是过分专注于推进那份修改后的计划,以至于无法再对为读者铺平道路这一工作投入太多精力。这种感觉源自沃格林作为一名著作家的特点中某个更广阔的方面。书评作者约翰·安格斯·坎贝尔(John Angus Campbell)说:“我认为沃格林并不十分关心他的读者怎么想。”[“Eric Voegelin’s Order in History: A Review”,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8(1982): 91]这颇有几分道理,尽管我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沃格林在写作中对分析准确性的重视似乎远远高于他对易理解程度的重视。与此类似,他似乎一贯专注于精密构建那些在理论上稳妥可靠,而非在辩论中更具说服力的表述,更倾向于激励有能力的读者承认他的结论,而不是诱使他们同意。在《天下时代》中有许多刺耳的观点,读者们不应急于断定这些观点表达不当。读者们也会从托马斯·霍尔维克(Thomas Hollweck)和保罗·卡林杰拉(Paul Caringella)的一项见解中受益:“沃格林算不算一位通常意义上的书籍作家?这一点大可争论。毋宁说,他的方法在于以反思性、思辨性的论文的形式解决问题;只有在能将多个问题排列为有意义群组的时候,他才会将它们组织成一本书。”[“Editors’ Introduction”, *What is History? And Other Late Unpublished Writings*, ed. Hollweck and Caringella (1990; availabl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 xv, vol. 28 of *CW*]的确,《天下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多篇意义相关的论文构成的群组,而不是一本常规意义上的书,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没有以常规性的导言开篇。

代》作为《秩序与历史》的延续来发表。因此,我们必须通过该卷所属的那项更广泛的研究计划来理解它。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将要求我们回溯《秩序与历史》的前三卷,进而回到《政治观念史》。后者是一项始于1939年的计划,而《秩序与历史》则是其产物。⁸在《天下时代》与《政治观念史》之间有许多有趣的关联,我们将谈到其中一些特别有启发意义的,但对这些关联的充分探讨则必须留待另一个场合。⁹此处最关键的还是要探究《天下时代》在什么意义上背离了《秩序与历史》的前三卷,又在什么意义上是它们的延续。

这两项解读任务同样重要,也同样具有挑战性。一方面,《天下时代》显然标志着重大变化,这已为沃格林关于“背离”一项研究计划的表述所证明,他“已放弃”该计划,因为其构想“不可行”。¹⁰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即便从《天下时代》的新视角看来,前三卷的理论基础也有许多依然有效——这些依然有效之处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必须质疑沃格林所说的“已放弃”是什么意思。正如沃格林的“导

8 《政治观念史》在沃格林在世时大部分未发表,但如今可见于《沃格林全集》第19—26卷。关于沃格林在《政治观念史》中所从事工作及其向《秩序与历史》的转变的详细描述,参见Thomas Hollweck and Ellis Sandoz,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Series”,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series ed. Ellis Sandoz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7—1999), vol. I, *Hellenism, Rome, and Early Christianity*, ed. Athanasios Moulaki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7), 1—47, vol. 19 of *CW*。

9 对《天下时代》真正全面的分析也将要求我们研究,《求索秩序》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秩序与历史》所经历的发展与变化的最后阶段?据我所知,到2000年为止,这一任务尚未完成,而就当下的目的而言,它也会令我们离题过远。不过,关于“从《求索秩序》的视角来看《天下时代》如何‘背离’《秩序与历史》研究计划”这个问题,可参见格哈特·尼迈尔的有益描述,“The Fulness of the Quest”, in *Eric Voegelin's Search for Order in History*, ed. Stephen A. McKnight (expanded ed.,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7), 196—215,特别是第209—211页。

10 这些用语依次引自本书第45页、第106页和第46页。这些表述引发如下问题:如果诸如此类的用语实际上都是有根据的,那么沃格林是否曾经与《秩序与历史》有过明确的决裂?我们将在这一节的结尾探讨这个问题。

言”开篇所示，他提出，原先设想的“该研究的原则并无错误”。他也提出，“该研究计划具有坚实内核”，“前三卷的分析在其各自领域内依然有效”。¹¹

这些表述并不那么容易理解，而且，就沃格林自己关于其著作中的这一转变的描述而言，《天下时代》的一些早期书评作者并未对其明晰程度留下深刻印象。例如，布鲁斯·道格拉斯在一篇关于本书的长篇论文中说，“我认为，沃格林关于这一转变的重大意义的看法是含糊不清的”，而且他“对《秩序与历史》研究计划出现的中断所做的解释，实际上只不过是加剧了围绕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而产生的混淆”。¹²我相信这一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但同时我也没看出它有什么特别值得谴责之处，因为很难说沃格林的描述具备了它可能具备的明晰性。在他从事《天下时代》的研究以及随后的一些年里，沃格林对推进其研究计划的兴趣要远胜于对整理其代表作的兴趣。我们很难责备沃格林的这种做法。对一位七十多岁的学者来说，这的确是相当令人钦佩的。然而，在“背离”和“放弃”《秩序与历史》据称是“不可行”的构想这个问题上，对《天下时代》进行研究的那些二手文献仍是相当混乱的。

我相信，只有在区分三项不同因素之后，我们才能准确理解沃格林想要放弃、修改或保留《秩序与历史》前三卷中的哪些内容：

- (1) 出版计划，这是他放弃的；
- (2) 分析构想，这是他修改的；
- (3) 基本原则，这是他保留的。

虽然不可能将这些因素视为完全互不相关的问题，但为了论述明晰，我还是要按顺序来对它们加以讨论。

11 EA, 46.

12 Bruce Douglass, “The Break in Voegelin’s Program”,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r* 7 (1977): 2, 4.

沃格林在《天下时代》开篇就宣布背离“我曾经在《秩序与历史》第一卷前言中为它设定的计划”。随后，他回顾了该计划，由此引出他对该背离的性质与原因的解释：

（第一卷）前言的第一句话表述了这项研究在其规划的六卷中遵循的原则：“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历史被视为一个对存在的秩序（人通过其生存参与其中）获得分化程度不断提升的洞见的过程。如果将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的主要类型，以及与之相应的对秩序的各种符号化表达，按照它们的历史先后加以呈现，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可被辨识出的那种秩序，包括对不断提升的分化的偏离与倒退，就将涌现。

随后，根据这一原则表述，我列举了该研究将要涵盖的秩序类型。它们是：

- （1）古代近东各帝国组织，及其宇宙论神话形式下的生存；
- （2）由摩西和被选民族诸先知所发展出的，启示形式下的在历史中的生存；
- （3）城邦和希腊神话，以及作为秩序的符号化表达的哲学的发展；
- （4）亚历山大之后的各个多元文化帝国，以及基督教的出现； 6
- （5）现代民族国家，以及作为秩序的符号形式的现代灵知主义的出现。

正如沃格林接下来解释的那样，卷一至卷三研究了前三种类型，而余下的两种类型原本预计要再用三卷加以研究。

在解释该研究为何无法按计划完成时，沃格林的看法是，“由各种

历史性的秩序中涌现的结构及其符号化比我预想的更加复杂”。¹³沃格林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结构及其符号化过于复杂以致无法理解。相反，他的意思是，它们非常复杂，难以在该系列原先预定的那三卷中得到充分的研究（或者说，如果该研究仍然按照原定模式进行，那么即便是一个大幅度扩充后的系列也无法实现充分研究）。沃格林在其“导言”的结论中暗示了这一点。他认为，“《秩序与历史》的原定研究计划为什么必须放弃，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那些既必须涵盖又相互交织的问题范围极广，对其加以分析所需的篇幅极大”。¹⁴在1973年录制的一篇谈话中，对这个问题的这种分析被以更加直白的方式表达出来：

但是，那项计划是无法实现的。有相当多的部分事实上已经写就，但这项工作由于篇幅问题而中断了。我总是面临这样的困扰：为了做出理论表述，我必须首先呈现资料，作为分析结果的理论表述正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的。如果我实施该研究计划，那么，前三卷之后的续篇将不只是原计划的另外三卷，而可能有六七卷之多。普通公众并不熟悉那些导向特定理论洞见的资料，因此，对理论洞见的呈现就离不开对资料的呈现。¹⁵

关于《天下时代》对《秩序与历史》原定计划的背离，“篇幅问题”部分地解释了个中缘由——但也仅仅是部分地解释。尤其是，这解释了为何取消旨在研究其余两种秩序类型（即多元文化帝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另外三卷的出版计划。但是，在取消原定出版计划时，沃格林并未否弃原计划所“遵循”的原则，即“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

13 EA, 46.

14 EA, 106.

15 Voegelin,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ed. Sandoz, 81.

沃格林明确坚持该原则，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又实质性地修改了该原则的两大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他修改了他对“秩序的历史必须怎样加以分析”的看法，并基于这种修改后的分析改变了他的历史观。

二

纵观《天下时代》的整体结构，我们可以认为，它的导言解释了沃格林为什么修改了他分析历史的方法，而后续章节则提供了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实例。虽然该导言并没有为这本书提供一篇常规性的序言，但它的结论部分揭示了其真实目的：“这篇导言自身所呈现的形式，正是历史哲学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必须采用的形式。”¹⁶ 这种形式与《秩序与历史》前三卷采取的形式截然不同。在早先那种形式中，“历史被视为一个对存在的秩序获得分化程度不断提升的洞见的过程”。这种存在的秩序（“人通过其生存参与其中”）包含“神和人，世界和社会”。沃格林认为，人“通过其生存”对这个共同体的参与就在于，在给定的具体条件下创建某种社会秩序，该秩序将赋予人的生存之事实以“基于神的和人的目的来表述的意义”。¹⁷ 在这个原初共同体中，神创造世界和人，而人创造社会，并由此建立起

一整个小世界，即小宇宙（*cosmion*），它被人由内部用意义加以说明，人连续不断地创造、孕育着它，将其作为他们自我实现的模式与条件。它是经由精密的符号化表达而得到说明的，这种符号化

16 EA, 106.

17 关于上述引文，参见EA, 45; *Order and History*, vol. I, *Israel and Revelation* (1956; availabl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 ix. [中译本参见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卷一），霍伟岸、叶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40页、第19页。——译注]

表达具有不同程度的紧凑或分化特性(从仪式开始,经过神话,再到理论)。所谓符号化表达用意义来说明小宇宙,是指在那些符号的作用下,对人的生存这一奥秘来说,这种小宇宙的内在结构、它的成员之间和由其成员组成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均变得毫无神秘可言。¹⁸

沃格林之前将历史视为一个对存在的秩序获得分化程度不断提升的洞见的过程,人们创建各个社会(或各种“生存类型”),以之作为宇宙的类比物,并发展出分化程度愈发提升的各种符号化表达,以便将他们的社会性创造物的秩序同存在的秩序相关联。如果说,这是沃格林关于**历史**的最初看法,那么,通过追踪各种“生存类型”在历史上的先后顺序,以及与之相应的各种细致地表达出所包含秩序的符号化表达的先后顺序,**历史的秩序**就将得到辨识。在这些表述的基础上,我们便能清晰理解沃格林在《天下时代》第一页关于《秩序与历史》的最初构想所做的既凝练而又非常准确的阐述:

历史被视为一个对存在的秩序(人通过其生存参与其中)获得分化程度不断提升的洞见的过程。如果将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的主要类型,以及与之相应的对秩序的各种符号化表达,按照它们的历史先后顺序加以呈现,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可被辨识出的那种秩序,包括对不断提升的分化程度的偏离与倒退,就将涌现。

这种关于秩序的历史的分析构想,被沃格林在《天下时代》中修改了。沃格林阐述了激发这一修改的两项进展。首先,秩序与符号化的

18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1952; rp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in *CW* 5: 109.

五种类型¹⁹不足以涵盖1957年之后的历史研究(包括沃格林自己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实际呈现的更多变体。其次,更具决定性意义的是,在两项新发现的压力下,那种将会使整个过程的秩序得以涌现的历史“先后顺序”难以成立:无法根据某种可被理解为历史“过程”的时间顺序来对为数众多的经验性秩序类型加以排列;有一种对秩序的符号化表达(“历史创生论”)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常态,任何关于“先后顺序”的想法正是因这种符号化表达的常存性而归于无效。

9

上述第一项进展比较容易应对。事实上,一旦沃格林确认了那些先于最初五种类型出现,或是无法为这五种类型所涵盖的秩序与符号化类型,他便遭遇到那个打断了原定出版计划的“篇幅问题”。正如他在《天下时代》中所回顾的那样,“随着我掌握更多的资料,原先关于五种秩序与符号化类型的列表变得殊为可叹地狭隘;然后,当这项研究必须依靠的经验基础得到扩展,以便与各种历史科学的状态保持一致时,手稿就膨胀到可轻易再出六卷的地步”。²⁰然而,即使沃格林扩充了旨在探讨余下两种秩序与符号化类型的卷本数量,从而设法维持原定出版计划,那些新发展也会使前三卷立论不牢。他在《自传性反思》中解释道:

由于各种历史科学,尤其是史前史和考古学领域的迅速发展,我开始写作《秩序与历史》时据以作为出发点的许多理论假定都已过时。在我写作《秩序与历史》第一卷时,我的视野仍受到近东诸帝国的局限。我把自己在那里看到的宇宙论符号化表达等同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帝国式符号化表达。如今,基于我们的史

19 即帝国组织与宇宙论神话、领受启示的生存与预言、城邦与神话、多元文明帝国与基督教,以及现代民族国家与灵知主义。

20 EA,46.